

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

· 文学卷 ·

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文学卷/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

ISBN 7-301-03729-5

I.北… II.北… III.①国学-文集②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Z126

书 名: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文学卷

著作责任者: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编

责任编辑:谢茂松

标准书号:ISBN 7-301-03729-5/C·0147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话: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9712 编辑部 62752032

排版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销者:新华书店

787×1092 16开本 38印张 940千字

1998年4月第一版 1998年4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66.00元

《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天有 叶 朗 李伯谦 乔 默
吴同瑞 费振刚 赵为民 袁行霈
程郁缀

秘 书: 耿 琴

本卷编辑委员会

主编	费振刚			
编委	王岳川	孙 静	李 零	杨 忠
	张 鸣	孟二冬	费振刚	袁行霈
	程郁缀	蒋绍愚	卢永麟	宋绍年
	高路明			
秘书	檀作文	张 梅	杨荣祥	

序 言

袁行霈

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年来一直处于开风气之先的地位,许多古老的学科在北大得以改造更新,许多新的学科首先在北大创立发展。这在国学的领域内尤其明显。例如,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是第一部由中国人撰写的文学史著作,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小说史的开山之作,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上卷)是用新方法整理中国哲学的尝试,这些书原来都是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或北京大学的讲义。又如,民谣的征集与整理以及由此兴起的民俗学的研究是从北大开始的,中国最早的考古学研究室也是在北大建立的。诸如此类,还可以举出许许多多。

这种新的风气,可以概括为以下两句话:会通古今,熔铸中外。北大的学者大多抱着关注现实的态度,研究古代的学问而不陷于故纸堆中,能够以今人的见识审视古代的资料,得出新的见解。北大的学者大多具有世界的眼光,关注外国的学问,努力与外国学者交流,将中国的学问放到世界学术文化的格局中进行考察,从而开出一条条新路。所以北大的国学研究自有一种高超的眼界、博大的格局和旷达的风度,这一切形成一种学问的气象,从一个方面体现出百年来北大的精神魅力。

北大是一片学术的圣地,许多大师级的人物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许多后起的学者又继续在这里辛勤的耕耘。如果以三十年为一代,那么一百年来大约有三代学者共同支撑起一座足以与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相称的宏伟的学术殿堂。我们把一百年来北大国学研究的成果加以精选,编成《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翻开这部书,读者可以从一个角度看到百年来整个国学发展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今天的国学与以前相比,无论研究的范围,还是研究的观念和方法,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初章太炎撰《国学略说》,分为“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史学略说”、“诸子略说”、“文学略说”五部分,所讲的都是我国几千年来固有的学术。现在和那时候相比,论范围已经远远超出,论观念已经几度更新,论方法也已经更加科学化、系统化。仅以小学而论,当初那种以通经为目标的学问,后来发展为以描述语

言文字发展规律为目标的学问；特别是甲骨文的发现，更使这门学问大为改观。在这一百年间，也有一些新兴的学科（如敦煌学），进入了国学的疆域；考古学的新成果，则引起史学巨大的变化。凡此等等，都使国学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所发生的这些变化，足以使我们今天的国学称之为“新国学”，而和以往的国学区别开来。

今后北大的国学研究应当更加注意学科的交叉，在多种学科的交汇点上，找到新的研究课题，开辟新的研究途径，建立新的研究领域。北大的学科齐全，实力雄厚，只要组织得好就一定会出现更加优异的成果。还应当继续扩大对外的学术交流，一方面将中国文化中优秀的东西介绍给世界，另一方面也从外国的学术文化中吸取有益的成分以充实自己。我相信通过广泛的交流，北大学者的素质会有很大的提高，研究水平也会相应地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上来。

值此北大百年校庆之际，我们谨将此书献给北大，献给中国和外国的好同好。如能引起学术界的兴趣，我们将感到欣慰。

一九九八年一月

目 录

序言·····	袁行霈(1)
论文·····	林 纾(1)
论文三篇·····	马其昶(5)
序文三篇·····	陈 衍(8)
文学研究法(节录)·····	姚永朴(10)
论诗三篇·····	黄 节(17)
唐宋至今文体·····	林传甲(21)
《诗经通解》例略·····	林义光(24)
魏晋风度以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鲁 迅(26)
家数·····	吴 梅(34)
南北文学不同论·····	刘师培(38)
人境庐诗草·····	周作人(42)
论慢词兴于北宋·····	刘毓盘(48)
《文心雕龙》札记(节选)·····	黄 侃(55)
《红楼梦》考证(改定稿)·····	胡 适(60)
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	孙楷第(80)
关于中国早期文艺思想的几个问题·····	杨 晦(95)
屈赋考源·····	游国恩(111)
影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十六回后记·····	俞平伯(128)
《南戏拾遗》导言·····	冯沅君(146)
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	浦江清(164)
论贾宝玉典型形象·····	吴组缃(181)
杜诗发展的基础与诗兴触发的契机·····	傅庚生(207)
韩愈的基本思想及其矛盾·····	季镇淮(219)
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	王 瑶(228)
关于《红楼梦》的成书过程·····	赵齐平(247)
《天问》中所见上古各民族争霸中原的面影·····	林 庚(267)
杜甫《秋兴》八首的艺术特点·····	冯钟芸(273)
《诗三百篇》臆札·····	吴小如(281)
钟嵘的诗歌理论·····	吕德申(294)
盛唐七绝刍议·····	陈贻焮(304)
史传与小说的融合——论《水浒》·····	吕乃岩(320)

谈《水浒传》在我国小说艺术典型化方面的贡献·····	沈天佑(327)
从潘德舆的《说诗牙慧》稿本到《养一斋诗话》·····	孙 静(336)
《离骚》的整体结构和求女、问卜、降神解·····	金开诚(348)
论《楚辞·九歌》的来源、构成和性质·····	褚斌杰(354)
论龚自珍的个性解放思想·····	孙钦善(367)
《三国演义》与《十七史详节》的关系·····	周 强(381)
梁玉菀园诸文士赋的评价及其相关问题的考辨·····	费振刚(386)
论《水浒》的思想倾向和艺术构思·····	周先慎(395)
论意境的美学特征·····	张少康(407)
陶渊明享年考辨·····	袁行霈(420)
王国维创造“新学语”的历史经验·····	刘 烜(434)
《世说新语》思想艺术论·····	侯忠义(444)
李华事迹考·····	陈铁民(451)
读脂批随札·····	陈熙中(461)
刘熙载的《艺概》及其辩证审美观·····	陈德礼(473)
创作范式的提倡和初盛唐诗的普及·····	葛晓音(482)
“以意逆志”辨·····	董洪利(492)
储光羲籍贯考辨·····	程郁缀(497)
意境理论胎萌于《文心雕龙》说·····	卢永璘(503)
梁启超与日本明治小说·····	夏晓虹(513)
即物即理,即境即心·····	张 鸣(524)
韩孟诗派的创新意识及其与中唐文化趋向的关系·····	孟二冬(536)
表现与再现的消长互补·····	钱志熙(549)
明清邸报与文学之关系·····	刘勇强(558)
论宫体诗·····	商 伟(572)
论元明戏曲中“大团圆”结局的演化·····	李 简(581)
“雅”“俗”观念自先秦至汉末的衍变及其文学意义·····	于迎春(588)

论文

林 纾

韩氏之文，能详人之所略，又能略人之所详。常人恒设樊篱，学韩则障碍为之空；常人流滑之口吻，学韩则结习为之除。蔽掩乃昌黎之长技。然能于蔽掩之中，有渊然之光，著苍然之色，斯则昌黎之所以为昌黎，非人之所能及也。

柳氏之文，学骚处当与宋玉抗席，幽思苦语，悠悠然若傍瘴花密箐而飞，读之几不知其在何境也。而柳氏尤精小学，熟于《文选》。用字新特，然未尝近纤；选材宏富，然未尝近滥。丽而能古，博而能精，生峭壁立，棱棱然使人望之生畏，柳氏之所独到也。

论文之书，韩柳各异。昌黎与人论文，必言作文之艰苦及回甘之滋味。柳氏则不然，但叙文人之遇及为文之流弊而已。韩氏之论文，论取材，论立志，论用心，论洗伐之功。柳氏则仅防无名，防流弊，防遇艰，防乱朱夺雅。韩之论文实则其主要，柳则并未论作文之法，不过把一腹牢骚，借文章以发泄而已。

余生平酷好《史记》。《史记》者，史公之创局，虽不及《左传》之千门万户，光怪陆离，然班氏望尘已不之及！但以魏其、灌夫、武安三传言之，蝉联而下，断而不断，如松际欲尽不尽之云，一经班氏窜改，便索然无味矣。余故谓《史记》所概有者，则可不读班书，而班书中为《史记》所无者，如赵皇后、霍光、赵广汉、王尊、贡禹、朱博、孙宝、何并及酷吏诸传，妩媚之处，亦正得力于史公，又为范蔚宗辈所不能到，则不可不谈也。

文必肖其性情以出，而后其言立。古之善为文者，性情不同，故面目万变。其不变者，法度出于一轨而已。虽或纯或驳，或高或下，程度至不一，要必有真性情存乎其中，而后读者感焉。今之为文者，涂饰以为工，征引以炫博，失其性情之真，以云自信，犹不足，欲以信人而信后世，乌可得哉？甚矣立言之难，能文者不可不知所戒也。

为文有二要：一曰获理，一曰适道。盖文有古今，而理与道无古今。自秦汉以至唐宋，虽间有统系派别之可言，必根于理而当于道，则一也。学者徒知分疆划界，以示适从，其志趣毋乃已左。虽然，获理适道，不但宜多读书，广阅历，尤当深究乎古人心身性命之学。偏于一则又失之。试观史家之文，多读书，广阅历者也，而隳突恣肆，无复规检；经生之文，则纯从心身性命上着想，又往往流于枯淡而寡味，此其大较也。

文忌直率。夫所谓直，盖放而不蓄之谓；所谓率，盖粗而无检之谓。初学狃于前辈阳刚之说，一鼓作气，极诸所有，尽情发泄而出。骤读之似有气势，不知气不内积，杂收糟粕，用为家珍，拉杂牵扯，蝉联而下，外虽峥嵘，而内无主意，无主意便无剪裁，此即成直率之病。不深究昌黎之文者，亦谓气盖一世。然昌黎之气直也，而用心则曲，关锁埋伏尤曲。丽泽《文说》曰：“鼓气以势壮

为美,势不可以不息,不息则流荡而忘反。”又曰:“不难于曲,而难于直。此何谓也?息者,停蓄也。昌黎之文,所谓势壮而能息者,能息亦由于善养。马之千里者,初上道时,与凡马无异,一涉长途,而凡马汗渍脉偃,神骏则徐所事。何者?气壮而调良,娴于步伐耳。文到纯时,亦无尝不主雄直,难于曲而有直体。”丽泽《文说》之所谓不难于曲,而难于直者,即曲中得直之谓。初学能于命局制词时,在在经心,于读古文之文字时,亦在在经心,又奚有直率之病。

苏氏父子之文,往往好设喻以动人观听,骤读之,无不点首称可,及详案事理,则多罅漏可疑处。然其文有光芒,宣气势,如少年将军横槊盘马,已足慑人之胆,此其不可及者。后人不足于理,但求足其文势,遂不得不袭苏氏故智。因事设譬,一譬足矣,不复求多,于是枵响腾于纸上,滞气渍于行间,则又学苏之病也。总之,无理与气而作长篇者,必坠入此阱无疑。

作文忌凡猥,故首尚严洁。严者,屏除凡猥之谓。洁者,洗涤凡猥之谓。然亦分序事、立言两端。方望溪与孙以宁书曰:“古之晰于文律者,所载之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此指序事而言也。至于立言,则当吐弃凡猥,万不能着以尘相。读刘勰氏《文心雕龙·体性篇》,可以知所法矣。

《韩昌黎集》中无史论,舍《原道》外,议论之文,多归入赠序与书序,至长无过五六百字者,篇幅虽短,而气势腾跃,有万水回环,千峰合抱之概。读之,觉其他长篇文字,尚无此隽味焉。

文之入手,不能无法,或终身束缚于成法之中,不自变化,纵使能成篇幅,然神木而形索,直是枯本朽株而已,不得谓之文也。譬如由韩柳入门者,一步一趋,惟韩柳是范。在初学时代,可谓能自得师。若久久而不变更,无论不能突过韩柳,即使神似,已成印板之文章,有何趣味哉。

文之雄健,全在气势,气不旺,则读者索然;势不蓄,则读之亦而尽。故深于文者,必敛气而蓄势,然二者皆须讲究于未临文之先,若下笔呻吟,于欲尽处力为控勒,于宜伸处故作停留,不惟流为矫伪,而且易致拗晦。苏明允《上欧阳内翰书》,称昌黎之文,如长江大河,深浩流转,鱼鳖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此真知所谓气势,亦真知昌黎之文能敛气而蓄势者。古之为文者,足于理,精于法,一题到手,已全盘打算,空际具有结构,无论宜吐宜茹,宜伸宜缩,于心了了。下笔有一定主张,一言也,烦言不见为多,省言之亦不见为少。所云遏抑蔽掩,是出诸读者之眼光,不是昌黎下笔时有意作此伎俩,以狡狴哗众也。

《平淮西碑》起句“天以唐克肖其德”七字,不知呕出多少心肝,才能想出。但如学之者,必语语如此,无论吃力不讨好,即能自然,亦近于趋奇走怪。须知文之能奇,必为情理中之所有,不过造语异于恒溪,非背理而求奇,匿情而求情也。吕东莱博议,全篇之意,往往定于发端之一二语,且皆精切于物理,最足醒观者之目。然全体多半如此,久读之亦索然无味矣。

为文者本宜多读书,亦万不能恃有多读书,即纵笔为文。譬之匠氏,储梧櫟而不备斤削,则梧櫟纵美,亦断不能成器。采伐渔猎,纵多又奚为者。

章实斋谓:“古人之言,欲以喻世,而后人之言,欲以欺世。非欺世也,有所私焉。”又曰:“古人之言,欲以淑人,今人之言,欲以炫己,非炫己也,有所不足焉。”数语推勘末俗之病源,可谓洞见症结。盖用诈可以牟利,而万不可以得名。且诈字可侥幸于事中,万不可能侥幸于文中。文为天下公器,谓能以一己私见,雍天下之目,杜天下之口耶!古人性之偏执者,莫如王临川,然观其文字,皆源本经术,虽不能见诸施行,尚未显悖古训,后人学不及临川,而又不根于经史,据其铢寸之才气,率意发议,以为奇特,习俗或从而炫之,而古文乃益衰矣。

才士多狂,狂则近谬,其理苦于古人范围之密,义法之严,知不能遁越而出,始纵情为放言高论,以只眼自矜,此等人必聪明绝笔,笔墨之间,有一种光气,足以夺人。故无识者,往往为其所动,以为不落古人窠臼,是有志之言。究其实,则留贻为世法者,盖仅仅也。

汪钝翁与曹木欣第二书,论文字必求圣贤之道,达于日用事物,而根柢修己治身。钝翁之意,似文当求实,不当徇才气之偏,逞聪明之臆,是也。然钝翁之为人,激烈好骂人,而文字颇沈实有道气,一无虚枵之病,当时称为国初三家。雪苑近剽,叔子近肆。极剽之流弊,必虚而无主,极肆之流弊,或放而过张。或云以虚枵加侯魏二子上,不无太过。然不善学二子者,往往身蹈此失,亦一准也。文体贵洁,原不应牵涉他事,然一事有一事之源,溯原因时,过简则鲜晰,过烦则病随,过疾则苦突,须在有意无意间用插笔请出,此刘彦和所谓理枝循干者也。《左传》为文家叙事祖庭,每到插叙处,辄用一初字领起,使遥遥两事,接于无缝。史家多循此例,用为插笔之法。而善学者厥为史公,或一传而数事,有从中变者,有从旁人者。魏善伯曰:“筋骨穿插处,不落小家。”亦正言其插笔之难也。文之用省笔,非略也,一略则应言而不言,令读者索然无趣。省又非漏也,漏则不惟于本文中多寡要之言,尤于插叙处少神来之笔。有首尾宜相应者,漏则莫应;有眼目宜点睛者,漏则勿清。省又非弃而勿举也。文之去冗删繁,孰则勿知,而往往犯此二病。肤说生庸,喋言成絮,弊在不知举其简要而弃其骈枝耳!姜白石曰:“人所易言,我寡言之。”寡言者,正谓其能吐弃一切,归于简当也。要非用笔加洗伐之力,临文有审择之功不可。省又非疏而未检也。欧公之文,似平易近情,然每为小简,亦必属稿,则其事已不视为玩易,何至于疏,又何至于不检。盖能用省笔,已节缩无数枝词,读之似疏,及挈其全局观之,又觉文之严洁处,本应如是。刘彦和曰,精论要理,极略之体。试问不精不要,又何能略?学者为文,欲求略,当先求精,惟蓄理足者,始有眼光,有眼光,始知弃取,知弃取则尽我所为。全局在握,此省笔之可贵也。

行文有伏笔,犹行军之设覆。顾行军之设覆,敌苟知兵者,必巧避不犯我之覆中。若行文之伏笔,则备后来之必应者也。故用伏笔,须在人不着意处,又当知此不是赘笔方佳。《左传》序无知事至兴层,然无知为雍廩所杀,乃不能就本文叙补,却在本文之先,另提一笔曰:“初无知虐于雍廩。”不伦不类,此可算得伏笔否?左氏文章之圣,固无施不可,吾辈学之,便矫强矣。

朱子尝谓吕伯恭是宽厚人,不知如何做得文字,却似轻儇底人。然东莱一生,于古文用功甚深,教人作文,第一看大概主张;第二看文势规模;第三看纲目关键,如何是主意首尾相应,如何是一篇铺叙,如何是抑扬开阖处;第四看警策句法,如何是一篇警策,如何是下字下句有力处,如何是起头换头佳处,如何是缴结有力处,如何是融化曲折剪裁有力处,如何是实体贴题目处。就此而言,决无轻儇之病,矧东莱尤非轻儇之人,不知朱子何所见而有是语。吾辈后生,不解先儒之言,阙之可也。

以文字言,则古文中决不宜落轻儇二字,竟陵、公安一派,固昔有人议为轻儇者,今读其文,钟伯敬涉于简易者多,然能自圆其说,亦颇有首尾。唯时病流走,过目即逝,不复耐人寻绎,谓之轻可也,而弊尚不至于儇。谭友夏劣于伯敬,而复竭力摹古,追逐不到,乃时露丑态,则实轻而儇矣。顾友夏摹古力不足而坠于轻儇,优何言也。若公安则恣肆不畏人,纪文达斥其破律坏度,实至相当之罪名也。

魏叔子曰,作论有三不必,二不可。前人所已言,诸人所易知,摘拾小事无关系处,此三不必作也。巧文刻深,以攻前人之短,而不中要害,取奇出新,以翻昔人之案,而不切情实,此二不可

作也。解得此言，则临文时自有一种雍和平易之气，不落偏执之消矣。

（录自《文学常识》第一期 1—9 页，中华编译所）

（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福建福州人。是桐城派晚期著名的代表人物，且是翻译家。曾在北京大学国文门执教多年。著有《春觉斋论文·论画遗稿》。）

论文三篇

马其昶

读九歌(壬寅)

余读屈原文，高其词，悼其不遇，意其始赞怀王，必有卓犖大计过绝人者。今所传，自《离骚》以下，皆原放斥后所为，《九歌》词旨尤不可骤晓。王逸称楚俗信鬼好祠，祠必作歌乐鼓舞。原陋其词，为作《九歌》之曲，陈己冤结且讽谏，故章句错杂。是说也，余疑焉。假令原欲自言志，奚托于事神？事神乃陈己冤结，神其读矣。其身既疏远，更欲致其蔽罔不可骤晓之词为讽谏，何其迂计者欤？且吾意古君子虽甚不得已于天下，其孤怀淹郁，不蘄白于途之人，决也，原奚喋喋至如此？及读《汉·郊祀志》载谷永之言曰：“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助却秦军，而兵挫地削，身辱国危”，乃知《九歌》之作，原承怀王命而作也。推其时，在《离骚》前。太史公称原博闻强志，明治乱，娴辞令，怀王使原造宪令，上官大夫见而欲夺其草稿，原不与，因谗之王曰：每一令出，原曰非我莫能为。怀王怒疏原。原岂自矜其能者？然当时为文，要无出原右。彼怀王撰词告神，舍原谁属哉？怀王十一年为从长，攻秦；十六年绝齐和秦；旋以怒张仪，故复攻秦，大败于丹阳，又败于蓝田。吾意怀王事神，欲以助却秦军，在此时矣。故曰“举长矢兮射天狼”。天狼者，秦分野也。其后十八年与秦和，张仪来谢，原使纵齐，来曰“何不诛仪”；二十年齐湣王为纵长，又合齐而倍秦；二十四年复与秦和。楚之衰，自怀王始。今读原所为辞，前后著其事神之敬，无己之情：《云中君》见神赋之无私，《湘君》、《湘夫人》反复于盟誓之不可信，修政之宜及时；《河伯》非楚境内，山川遥望，僭祭之非礼，即神所弗格，《山鬼》明淫祠祷祀之无益；而《大司命》、《少司命》因其祈福，上陈性命之情，祝宜子拔不祥，而隐动其为民父母之心。至所谓“事神若鬼，欲以助却秦军”者，则为盛言。当时声色之娱嬉，兵祸之惨怛，利害明白昭著如此，倘所谓卓犖大计，非耶。怀王不寤忠谏之旨，竟虏于秦，为世大僂，无足怪。乃至千百世读其文，亦无能通知其竟者，或且疑其“章句错杂”，悲夫！古今贞臣烈士，孤苦不可告语之怀，不吾知则已矣；而祸孽卒构于家国，兹屈子所为痛心也。甚矣哉，儿童之见也！当怀王时，乃欲持孱楚，媚鬼神，以却虎狼之强秦也，宁有幸乎哉！（吴先生曰：“以谷永之言证《九歌》为承王命而作，议创而近是，收束神来气来。”陈伯严曰：“据《郊祀志》定《九歌》为承怀王命而作，乃成确谊，而文情绵渺，若不可控搏。”）

桐城古文集略序(丙戌)

总集盖源于《尚书》、《诗三百篇》。洎王逸《楚辞》、挚虞《流别》后,日兴纷出,其义例可得而言;萧《选》务取藻绩;真氏《文章正宗》乃一根于理道;姚宝臣《唐文粹》、吕东莱《宋文鉴》则意在备一朝文献。三者,纂述之大凡也。其或录一郡一邑之文,则皆以备文献者类也;录经世之文,则皆宗于理者类也;标格领奇如楼迂斋、谢叠山之所为,则皆习于文者类也。由前所为,有裨实用,然旁收泛滥,务盈卷帙,或失则芜;由后所为,涂抹古书,品藻狼藉,或失则陋。唐宋以来,作者众矣,而世之治古文者,独取韩柳欧曾王苏之作;一二深识之士,又谓明归氏及我朝方侍郎足以继之。岂故隘其途哉?诚慎之也。侍郎为吾邑文学之宗,再传于姚姬传先生。于是遂本其所闻刘学,博及世父编修君之绪论,为《古文辞类纂》一书,刊伪砭俗,启示径途,然后学者知由唐宋秦汉以上溯六经,盖蔚乎大雅之林矣。师友渊源,各有所自;文儒之兴,瘡乎他邑。昔戴存庄孝廉与方伯堂先生编《桐城文录》,未就。其昶僭不自揆,有志重辑,惧其复蹈前所陈者之失也。凡所取录,义主于备文献,又必其理高而辞尤雅者。起国初到今,文三十五家,以类区十二卷;其集佚及所未见者不与。夫论文而至限之一邑,固视天下以不广;然而一邑之文有非一邑所能私者,后之君子或欲考论文章体势之正变、学派之流别,庶几其有取焉。

屈赋微序(乙巳)

《汉·艺文志》屈原赋二十五篇;王逸《楚辞章句》,《离骚》一、《九歌》二、《天问》三、《九章》四、《远游》五、《卜居》六、《渔父》七、《九辨》八、《招魂》九、《大招》十,其篇第与《释文》互异,皆不以作者先后次序,《释文》次宋玉《九辨》于《九歌》前。王逸既以《招魂》属宋玉,《大招》属屈原,而又次《大招》于后。太史公明言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则《招魂》为屈原作固然无疑。逸乃以《大招》当之,误矣。洪兴祖则断自《渔父》以上为屈赋,以符《汉志》二十五篇之数;朱子《集注》一承用其说。盖《九章》九篇、《九歌》十一篇,九者,数之极,凡甚多之数皆可以九约之,文不限于九也。王船山先生说《九歌》前十篇皆有所专祀之神,至《礼魂》则送神之曲,为前十篇所通用。然则《礼魂》各附前篇之末,不自为篇数。今定自《离骚》至《渔父》二十四篇,入《招魂》一篇,凡二十五,与《汉志》适合,盖原之赋具此矣。淮南王安序《离骚传》,以谓兼《国风》、《小雅》之变,推其志,与日月争光。太史公采其说入本传,而益反复明其存君兴国之念,无可奈何而继之以死。悲夫!死,酷事耳。志定于中,而从容以见于文字,彼有以通性命之故矣。岂与夫匹妇匹夫不忍一时之悁忿而自裁者比乎!天地之气,储与扈冶,为人物之所公得,而其间条缕分晰,乃至杪忽不相越紊。宗国者,人之祖气也。宗国倾危,或乃鄙夷其先,故而潜之他族,冀绵须臾之喘息,吾见千古之贼臣篡子,不旋踵而即于亡者。其祖气既绝,斯无能独存也。事可为,则单瘁心力,善吾生,且善人物之生。一人一物之生不善,即吾之气不有亏乎?事不可为,则返其

气于太虚，太虚不毁，彼其气之浩然者，旁溥而长存，吾又未见屈子之果为死也。性与性相通于无尽。是故屈子书，人之读之者，无不唏嘘感泣；然真知其文者盖寡，自王逸已见谓文义不次。今颇发其旨趣，务使节次瞭如秩如。分上下二卷，名曰《屈赋微》，人之读之者，其益可兴起而决然祛其疑惑乎？又非徒区区文字得失间也。光绪三十一年夏五月戊戌，桐城马其昶叙。（陈伯严曰：“醇意高文，其声激楚。”）

（马其昶（1855～1930），男，安徽桐城人，是桐城派晚期代表人物之一。光绪年间任学部主事、京师大学堂教席，曾在北京大学执教多年。著有《抱润轩文集》。）

序文三篇

陈 衍

知稼轩诗序

君常既刊其诗，数年，复哀后所得者总而刊之，问序于苏堪。苏堪请以属余。余适自都归里，过苏堪海上，苏堪语余，君常又督促甚亟，乃言曰——

君常文字，皆学苏者也。长公之诗，自南宋风行靡然，于金、元、明中熄，清而复炽，二百余年中，大人先生殆无不濡染及之者。大略才富者喜其排奭，趣博者领其兴会；即学焉不至，亦盘硬而不入于生涩，流宕而不落于浅俗，视从事香山、山谷、后山者受病较鲜，故为之者众。张广雅论诗，扬苏斥黄，略谓黄吐语多槎牙，无平直，三反难晓，读之梗胸臆，如佩玉琼琚，舍车而行荆棘，又如佳茶，可啜而不可食；子瞻与齐名，则坦荡殊雕饰，受党祸为枉，亦可见大人先生之性情，乐广博而恶艰深；于山谷且然，况于东野、后山之伦乎？

吾乡人之常为诗者，余识叶损轩最先，次苏堪，次弢庵，又次乃君常；而君常所常与为诗者，弢庵与余外，则有叶肖韩、陈征宇。之数子者，身世皆略如其诗。损轩少喜樊榭，继为后村、放翁、诚斋，螭屈微官以终，差相似矣。苏堪原本大谢，浸淫柳州，参以东野、荆公。余尝谓达官而足山林气者，莫如荆公，大谢、柳州抑无论矣。弢庵意在学韩，实似荆公，于韩专学清隽一路。肖韩、征宇则雅学后山。独君常才笔驰骛自喜，中年以后时敛就幽复，然终与坡公为近；其间有忧愁牢落，托于《庄》、《骚》之旨者，亦坡公之忧愁牢落也。近作清苦不怡，遂足以感召忧患，中夜彷徨良久而乃释。君之于诗，亦尚为张广雅所谓坦荡者，勿过求幽复为哉！

癸丑谷雨节 陈衍

癸庵诗序

严仪卿有言：“诗有别才，非关学也。”余甚疑之：以为六义既设，风、雅、颂之体代作，赋、比、兴之用兼陈，朝章国故，治乱贤不肖，以至山川风土草木鸟兽虫鱼，无弗知也，无弗能言也；素未尝学问，猥曰“吾有别才也”，能之乎？汉、魏以降，有风而无雅，比兴多而赋少；所赋者眼前景物，夫人而能知而能言者也；不过言之有工拙，所谓“有别才”者，吐属稳，兴味足耳。若《三百篇》，则朝章国故治乱贤不肖之类，足以备《尚书》、《逸周书》、《周官》、《仪礼》、《国语》、《公》、《谷》、《左

氏传》、《戴记》所未有；有之必相吻合；其有不合，则四家之师说异同，齐、鲁、韩之书缺有间者也。未尝学问，猥曰“吾有别才也”，能为之乎？汉、魏以降，其谋篇也，首尾外两两支对，拗体之律句而已；前写景，后言情，千篇而一致也。微论《大小雅》，《硕人》、《小戎》、《谷风》、《载驰》、《氓》、《定之方中》诸篇，六朝人有此体段乎？《绿衣》、《燕燕》，容有之耳。微论《三百篇》，《骚》之上帝馨，下齐桓，六朝人有此观感乎？“滋兰树蕙”，容有之耳。故余曰：诗也者，有别才而又关学者也。少陵、昌黎，其庶几乎！然今之为诗者，与之述仪卿之言则首肯，反是则有难色；人情乐于易，安于简，“别才”之名又隳绝乎丑夷也。

揆东为诗未久，而以余所知，有沉酣有年而思力笔力未如其陷入而抉出者。顾与之游数年，其有所作，未有自以为可，不使尧生若余批根而剔刮之者。有以“别才不关学”之说进乎，吾知其不敢闻也。

今年余自都归里，揆东哀辛亥以前诗二百余首，属余从容时日，痛下绳削。余不敢辞，携归数月，乃为删去九十余首，其存者又悉为献可替否而归之；复深辩仪卿之言，以为之序。

（录自《石遗室文集》卷九）

剑怀堂诗草序

吾闽诗人，至宋而大昌，至明而力足以左右天下风气；清则茶然以衰，瓯香、雁水后，莘田、荔乡以风韵胜，檀河、亨甫以才气称，此外驱驰中原，为海内所指数者，未数数然也。

今之人，喜分唐诗、宋诗，以为浙派为宋诗，闽派为唐诗，咎同、光以来，闽人舍唐诗不为而为宋诗。夫学问之事，惟在至与不至耳，至则有变化之能事焉，不至则声音笑貌之为尔耳。唐人之声貌至不一矣，开、天、元和，一其人，一其声貌，所以为开、天、元和也；开、天之少陵、摩诘，元和之香山、昌黎，又往往一人不一其声貌。故开、天、元和者，世所分唐、宋诗之枢干也。庐陵、宛陵、东坡、临川、山谷、后山、无咎、文潜，岑、高、杜、韩、刘、白之变化也；简斋、止斋、沧浪、四灵，王、孟、韦、柳之变化也。子孙虽肖祖父，未尝骨肉间一一相似，壹壶化生，人类之进退由之；况非子孙，奚能刻意蕲肖之耶！天地英灵之气，古之人盖先得取精而用宏矣。取之而不能尽，故《三百篇》、汉、魏、六朝而有开、天、元和、元祐以至于无穷，在为之至与不至耳。

己舟先生，以名孝廉，屡困公车，值天下兵革，往来戎马寇盗间，中更悼亡。《剑怀堂诗》，凄惻者追莘田，牢落者近亨甫，身世然也。因纵论唐、宋诗离合之故，非强以声音笑貌为者。为先生之诗叙。

（录自《石遗室文集》卷九）

（陈衍（1856—1937），晚号石遗室主人，福建福州人。是同光体代表诗人之一，也是著名诗评家。曾在北京大学国文门执教多年。代表著作为《石遗室诗话》。）

文学研究法(节录)

姚永朴

一 运会

《文心雕龙·时序》篇云：“昔在陶唐，德盛化钧，野老吐‘何力’之谈，郊童含‘不识’之歌，有虞继作，政阜民暇，‘薰风’诗于元后，‘烂云’歌于列臣。尽其美者何？乃心乐而声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咏功；成汤圣敬，‘猗欤’作颂。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太王之化淳，《豳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春秋以后，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飚骇。方是时也，韩、魏力政，燕、赵任权；五蠹六虱，严于秦令；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齐开庄衢之地，楚广兰台之宫，孟轲宾馆，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邹子（衍）以谈天飞誉，驺奭以雕龙驰响，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炜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爰至有汉，运接燔书，高祖尚武，戏儒简学。虽礼律草创，《诗》《书》未遑；然《大风》、《鸿鹄》之歌，亦天纵之英作也。施及孝惠，迄于文、景，经术颇兴，而辞人勿用，贾谊抑而邹、枚沉（邹阳、枚乘），亦可知已。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柏梁展朝宴之诗，金堤制恤民之咏，征枚乘以蒲轮，申主父（偃）以鼎食，擢公孙（宏）之对策，叹倪宽之拟奏，买臣负薪而衣锦，相如涤器而被绣；于是史迁、寿王（吾邱氏）之徒，严（安）、终（军）、枚皋（乘子）之属，应对固无方，篇章亦不匮，遗风余采，莫与比盛。越昭及宣，实继武绩，驰骋石渠，暇豫文会，集雕篆之逸材，发绮縠之高喻，于是王褒之伦，底禄待诏。自元暨成，降意图籍，美玉屑之谈，清金马之路，子云锐思于千首，子政雠校于六艺，亦已美矣。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离骚》：“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余影，于是乎在。自哀、平陵替，光武中兴，深怀图讖，颇略文华。然杜笃献谏以免刑，班彪参奏以补令，虽非旁求，亦不遐弃。及明、章叠耀，崇爱儒术，肄礼璧堂，讲文虎观。孟坚珥笔于国史，贾逵给札于瑞颂，东平（宪王苍）擅其懿文，沛王（献王辅）振其通论，帝则藩仪，辉光相照矣。自和、安已下，迄至顺、桓，则有班（固）、傅（毅）、三崔（骞、瑗、实），王（延寿）、马（融）、张（衡）、蔡（邕），磊落鸿儒，才不时乏，而文章之选，存而不论。然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华实所附，斟酌经纬，盖历政讲聚，故渐靡儒风者也。降及灵帝，时好辞制，造皇羲之书，开鸿都之赋；而乐松之徒，招集浅陋，故杨赐号为骹阹，蔡邕比之俳优，其余风遗文，盖蔑如也。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